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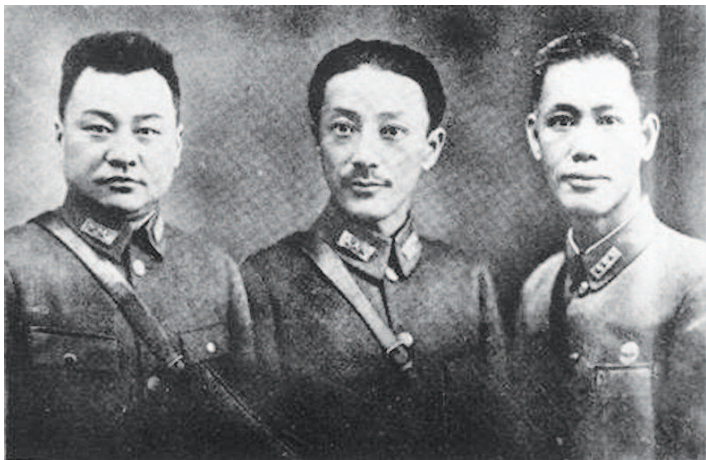
◀ (上接4版)

宁桥”，位置“在天通庵”，此处的“天通庵”就是村集之名，不应简单视作桥在庵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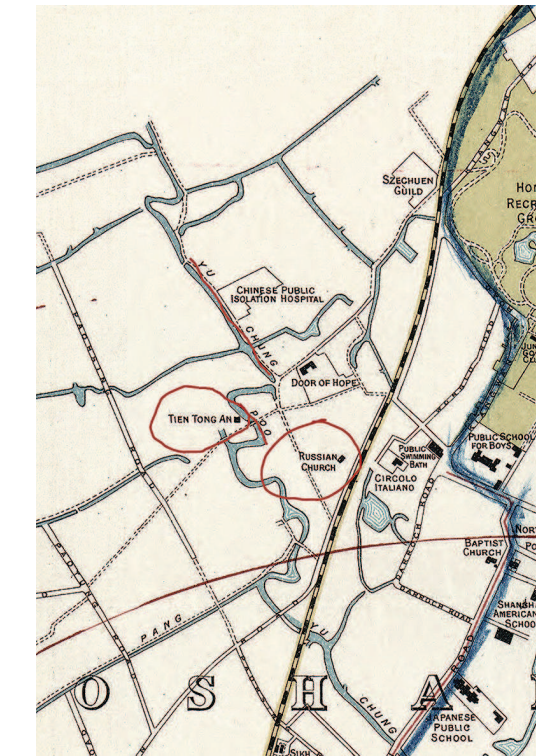
江南地区素有因寺成镇的传统，光上海地区便能找出多处实例：法华寺而有法华镇、七宝寺而有七宝镇、真如寺而有真如镇，南翔寺（云翔寺）而有南翔镇，龙华寺而有龙华乡，静安寺不仅有旧时静安寺路，今天更是保留了静安区这样的大名。天通庵虽也因循此例，终仅命名了村与街道，连庵堂本身都不易寻觅，这较之法华、七宝、真如、南翔、静安这几座江南有名大刹，确实不能同日而语；但天通庵一地却因中国的近代化浪潮，以及此后更为残酷卓绝的战争，以更为特殊的方式而扬名于世。

比如，光绪宝山志中就提到，“天通庵”是江湾镇治下排名第一繁华的村集。虽然这里一开始是一个小农村，但地近租界，毗连商埠，民国初年已经有商铺二十余家，并开设有丝厂、染织厂等机构，存市面貌日益繁华，已经与大上海商场无异，“迥非曩时村集气象矣”（《民国宝山县续志》卷一）。这里有“福和”、“三元”、“文记”诸厂产的丝绸，“精益”的皮革、“三益”的绵线球，“美华利”的自鸣钟，“宝山玻璃公司”的玻璃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产业结构非常合理。

天通庵本身也是淞沪间水陆交通的重要中转。航运之外，民国初天通庵地区便有多条新修近代马路可通达，其中大多数故道甚至是路名，还保留至今。江湾镇至天通庵之间，有条光绪中叶时所修的石路“江湾路”，起点是江湾镇走马塘南的香花桥，终点就是天通庵，长约九里，为商贩往来要道，由天通庵一带蜀商公所的职员张杏农发起建造的，今天这条路大约就是新市路—西江湾路沿线。另一条路更是以“天通庵”为路名；天通庵路也一直保留至今。此路为民国六年所筑的泥石混合路，长五百十丈（约1.5公里），造价四千八百余元，当时尚有“二百丈”没完工。那时所筑天通庵路，西起会馆路，东至横浜路，今天横浜路以东至天通庵遗址部分还未修建。今天的天通庵路基本在民国原路的基础上扩建而成，从今天马路所及可以推测，这一带应该是当时那个重要“村集”天通庵的核心区域。老天通庵路西首的“会馆路”，今天应该就在静安区会文路附近，那里曾以湖州会馆而闻名。那所著名的湖州会馆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总工会所在地，1927年上海工



十九路军三位指挥



1918年《上海地图》

灵谷寺
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

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与一个月内的“四·一二”政变，都曾在这里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记。

有鉴于这片村集的重要性，光绪年间两次修建上海至吴淞铁路；吴淞铁路（1876）与淞沪铁路（1897），上海始发的第二站都选在了这里。当时修火车站的惯例，车站都设于市镇中心的外围，上海站（老北站）被放在了上海县与宝山县教界处，江湾站放在镇南崑福寺旧址边，天通庵站也放在了这片村集的北面，天通庵路犹未能修到的地方。

1927年3月，为了响应北伐军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，在周恩来、赵世炎、罗亦农等同志指挥下，攻占天通庵站，将北洋派来支援上海的毕庶澄部打散。毕庶澄经由租界逃回青岛后，被其上司张宗昌授意枪决。

五年后的1932年1月28日，日本借口“日僧被殴”事件，乘深夜出兵天通庵车站，并希望自天通庵站进入上海站（老北站），被中国守军十九路军及时发现，双方围绕这座车站进行激烈的拉锯战。在军长蔡廷锴、总指挥蒋光鼐的指挥下，中国军队于天通庵宝山路一线与日军进行了殊死巷战。两周之后张治中奉命率由拱卫南京的警卫军87、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，驰援上海前线，与十九路军并肩战斗，是为震惊中外的“一·二八事变”。

五年之后的1937年夏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8月13日，

参加过“一·二八”战役的87师率先在天通庵边芦泾浦上游的八字桥上，与日军交火，车站附近很快又沦战场；一场被后世喻为“血肉磨坊”的淞沪会战，就在天通庵点燃。

天通庵在哪儿？

翻检县志已不足以提供天通庵庵堂的位置，幸好近代上海还有存世多版老地图可供检索；但想从传世的老地图中找到天通庵，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其中原因之一，便是天通庵村集一带位于华界之外，上海旧时地图多热衷于绘制租界华界的市区范围，而对有铁路相隔的“郊区”或多或少有些敷衍。比如老地图中的代表作1947年出版的《上海市行号路图录》、更流行的名字《老上海百业指南》的图中，便只画到四川北路横浜桥附近，正好忽略天通庵。甚至，且不论村集之地的天通庵，就连赫赫有名的淞沪铁路第二站的天通庵火车站，好多地图都不甚乐意标出，这实在让人挠头。民国二年（1913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地图》，就在最边缘角落里，轻轻地提到了“天通庵”。

图中用红圈标出者便是天通庵位置。不过此图中天通庵已非常边缘，殊不易判断其准

确位置；而近在咫尺的天通庵站，地图也未能标出。不过，其中与天通庵相邻有一座“俄国教堂”值得注意。

1918年《北华捷报》出版的《上海地图》中，这个区域绘制得更为仔细了。

图中的“YU CHUNG POO”，即为“俞泾浦”，可见那时的本地人口中“芦泾”、“俞泾”已经分不开了。天通庵“TIEN TONG AN”的位置更为清晰，位于俞泾浦转弯的西南侧。隔着俞泾不远在铁路西侧，依然可见那座俄国教堂（RUSSIAN CHURCH）。那里就是中国最早的东正教堂之一的“主显堂”，始建于1903年，毁于两次淞沪战争，位置大约今天宝山路874号附近。天通庵与俄国教堂西北侧，有一处“Door of Hope”，为当日解救从良的妓女“济良院”，西侧有“CHINESE PUBLIC ISOLATION HOSPITAL”，为“中国公立医院”；从县志来看，这两家公共事业的创办人中，都有一位叫沈敦和的宁波人。作为一位剑桥大学法科的毕业生，沈氏学问出入法律、工商、教育、国际关系等多领域，不过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公共卫生与医疗普及方面的贡献，正是他亲手缔造了中国红十字会。

更可以注意的是上图“天通庵”下的一条虚线，其位置当为建设中的天通庵路，庵前大路以庵命名是为惯例，路面跨过芦泾浦处，应该曾经有

座县志里记载的“永宁桥”。俄国教堂与天通庵之间连线，基本与宝山路淞沪铁路线垂直，与今天地图查得基本相似。终于，这座著名的“非著名”寺院，算是找到了。

结语：顽强的名字

“一门儿里，有人当面子，就得有人当里子”；更有的人就留了个名字。

读书时候，钟爱一首民谣 *I'm Yours*，对其中一句尤其印象深刻：

It's what we aim to do,
Our name is our virtue.

这句“名字即我们的优势”，用在天通庵的身上可谓异样的别致。这座在乡镇地方都不甚受人重视的小庵堂，因为地理、交通、商贸甚至是战争等多重因缘，硬生生将自己的名字刻进了驳杂丰富的近代史之中；即便长久以来谁都不记得它的庵堂身在何处。

套用一句佛家讲的，“说是天通庵，既非天通庵，是名天通庵”；找寻天通庵的一开始，我们便知道那里不过就是一间小庙，这段找寻过程的意义，其实是为了重温那段属于近代江南的风云与回忆。

（作者单位：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）